

黃英哲 許雪姬 楊彥杰 主編

台灣省編譯館檔案



中華

臺灣省編譯館
成立紀念
六年

長

許壽裳

五

月三十一

一

三十五年六月十五日起任
十六年五月卅一日止計在本
後月薪為陸佰捌拾元特此



海峽出版發行集團

福建教育出版社

黃英哲 許雪姬 楊彥杰 主編

台灣省編譯館檔案

中華



十六年五月廿一日止計在本館
復月新為修佰捌拾元特此證
十五年六月十五日起任本
編字第一壹號



海峽出版發行集團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湾省编译馆档案/黄英哲,许雪姬,杨彦杰主编.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334-5442-5

I. ①台… II. ①黄…②许…③杨… III. ①编译社—档案
资料—汇编—中国—民国 IV. ①G23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1079 号

台湾省编译馆档案

黄英哲 许雪姬 杨彦杰 主编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电话: 0591-83733693 83706771

传真: 83726980 网址: www.fep.com.cn)

出版人 黄旭

发行热线 0591-83752790

印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福州新店南平路鼓楼工业小区 邮编: 350012)

开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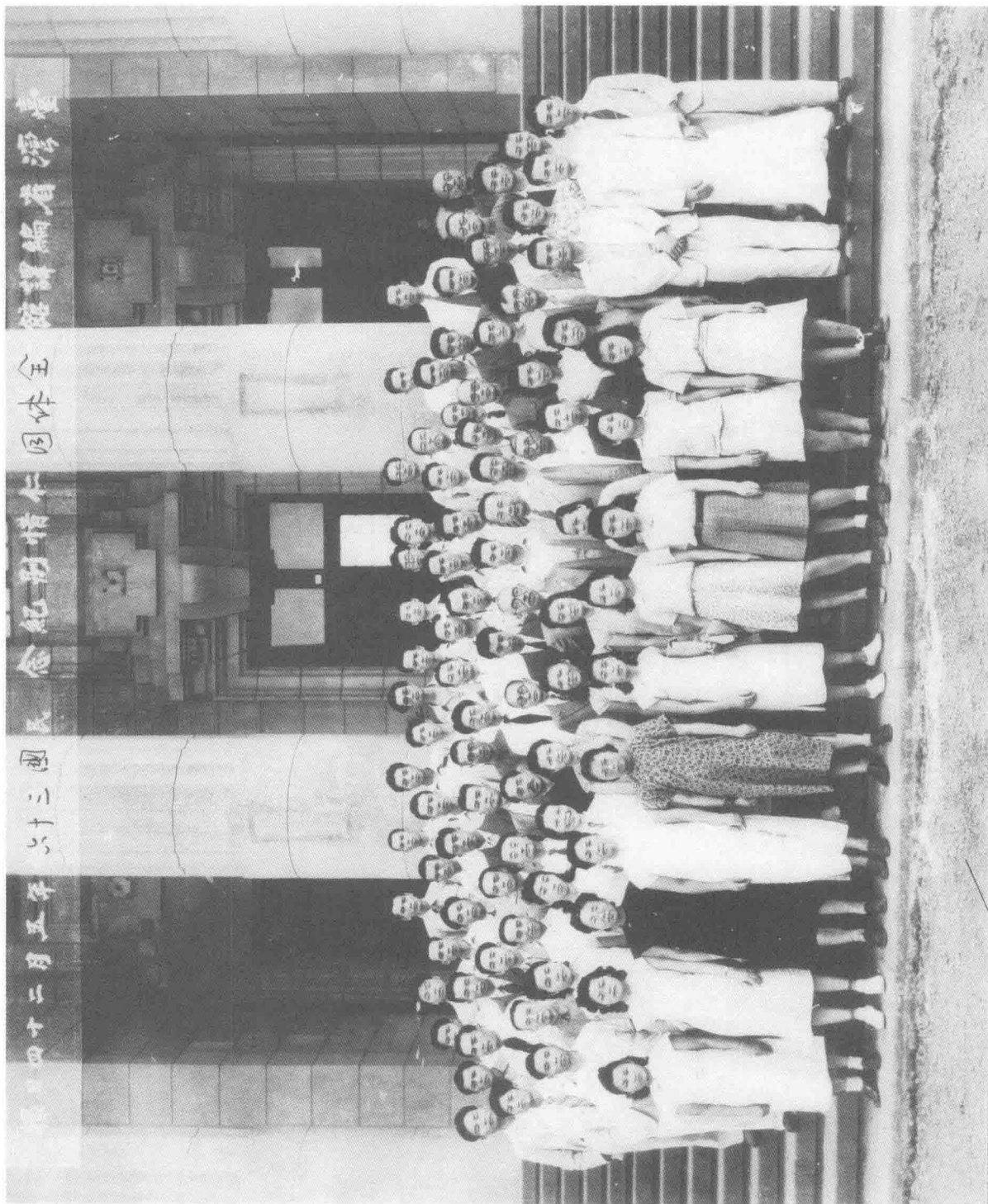
印张 69.25

版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5442-5

定价 360.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市场营销部(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1947年5月24日，台湾省编译馆全体同仁惜别纪念合影

序：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的整理出版

杨彦杰

光复初期（1945～1949）在台湾现代史上是极为重要的阶段。这时，台湾刚刚摆脱日本 51 年的统治，百废待兴，社会重建工作千头万绪，刻不容缓。而 1947 年又发生二二八事件，这对于台湾现代历史的发展是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

光复初期台湾的社会重建内容广泛，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其中文化建设亦称“心理建设”，其核心是消除日本文化的影响，在台湾重建中华文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时在台湾主政的陈仪决定设立一个编译馆，以编辑教科书、社会读物和翻译世界名著等为主要任务，并邀请他的同乡好友许寿裳来台主持此项工作。台湾省编译馆从 1946 年 8 月 7 日正式成立，到 1947 年 5 月 16 日因二二八事件的影响被撤销，前后不到一年，但它的设立和工作目标却是当时台湾社会文化重建不可或缺的一环。

有关台湾省编译馆的研究，以往学术界关注较少，其中最有名的学者是日本爱知大学教授黄英哲先生。黄教授出生于台湾，后来留学日本便留在那里工作。他的力作《“去日本化”“再中国化”：战后台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麦田、城邦文化出版，2007. 12）为两岸研究台湾文史的学者所熟知。2008 年 5 月，我有幸与黄英哲教授认识。当时他与秦贤次、陈漱渝、肖振鸣合编的《许寿裳日记（1940～1948）》（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正要出版，我们很高兴这本新书的首发式就在闽台缘博物馆举行。在仪式上，黄英哲教授除了发表感言外，还把他收藏的许寿裳日记手稿原件捐给博物馆收藏。当天（5 月 3 日）下午，我们在闽台缘博物馆举办了“纪念许寿裳遇难 60 周年学术座谈会”。黄英哲教授热爱学术，但不独享学术资源，他的这种胸襟和人文情怀令人感佩！

2008 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我应邀到日本爱知大学访问。期间除了学术交流之外，黄英哲教授还让我看了未整理的台湾省编译馆档案。我们都知道这批档案的价值，因此决定把它尽快整理出版，同时还商量要邀请台湾中研院台史所所长许雪姬教授来一起合作，并讨论了具体的工作流程、时间安排和分工合作等内容。

2009 年 4 月，经博士生帮忙，黄英哲教授把台湾省编译馆档案的扫描件发送到闽台缘博物馆，我立即组织博物馆研究部的同仁着手进行整理和录入工作。其间，研究部的庄小芳、李照斌、王湛三位最为辛苦，他们很仔细地辨识每个难认的字迹、印戳，千方百计地把档案留下的所有文字信息都尽可能呈现出来。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录入

工作基本就绪，又经几番交叉校对，并依据《许寿裳日记》对一些文件做考订注释，至今年初，这批档案的整理稿已大致成型。

2010年3月，黄英哲教授到苏州大学访问，我带领研究部的两位同仁到苏州与他见面。我们详细商谈了档案的编辑体例、出版等各项事宜。此后，黄教授把整理稿和扫描件发给许雪姬教授。许教授立即组织台史所档案馆的同仁进行再次核校，提出了不少中肯建议，有些难辨的字迹在她手上给认出来了，为本书增色不少。同时，黄、许两人还合作撰写了《台湾省编译馆关系人物简介》。

在此期间，黄英哲教授又两次发来一些与编译馆有关的公文书信扫描件。北京鲁迅博物馆原来也藏有许寿裳相关史料，经查找有8件与编译馆有关，在征得同意后，这8件档案的扫描件也一并整理、编入本书出版。在此，要特别感谢北京鲁迅博物馆对这批档案汇集整理的大力支持！除此之外，原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现改名“国史馆台湾文献馆”）亦藏有部分台湾省编译馆的档案，主要是人事方面，但由于联合出版尚有些困难，只好割爱。

目前已经整理的这批档案共计309件，分为四类，其中行政150件、人事54件、财务10件、书信95件。这个分类是依据每个文件的内容做大致区分，不见得特别准确。如有的书信与编译馆的日常工作紧密相关，就放在行政类；有的是推荐人员的信件，则置于人事类，并不是所有书信都放在同一类别。每个类别又依照文件的日期做先后安排，但很多文件并无日期，有的经过考订可以确认，有的只能根据内容做大致判定，或者将同一性质的文件（如工作旬报表、个人简历等）都集中放在一处。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使用。另外，本书将档案整理稿和扫描件分别刊出。每个文件不管是整理稿还是扫描件都编有一个相同的号码，读者可以按照这个号码将整理稿与扫描件对照阅读，以减少整理过程中造成的不必要失误。书中肯定还存在一些问题或不足，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的整理出版凝聚着很多人的心血，包括黄英哲、许雪姬和笔者，我们三个团队的许多同仁庄小芳、李照斌、王湛、黄辉菲、王丽蕉、黄燕秋、游子宜、王敬翔、丁怡萌、汤原健一等都作出了努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同时，要感谢北京鲁迅博物馆黄乔生副馆长、肖振鸣主任的热情协助！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黄旭社长、孙汉生副社长的大力支持，林冠珍编审为本书的最后问世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深表谢意！

闽台缘博物馆自成立伊始，就致力于开展闽台关系史相关文献的收集和研究。我们计划出版两套丛书：一为“闽台缘文献丛刊”，此前已出版《西洋铜版画与中法战争》（与台湾秦风先生合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3），本书的出版可算是此套丛刊的第二种。另一套为“闽台缘研究丛书”，专门收录最新的研究成果，包括田野调查报告等。我们希望通过不断的努力和积累，为闽台关系史研究尽一份心力，作出应有的贡献。

序：欣见台湾省编译馆相关档案出版

许雪姬

许寿裳先生（1883～1948）是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邀请来台从事“台人心理改造”的掌舵者。他以台湾省编译馆（以下简称编译馆）馆长的身份来台，努力10个月，离陈仪认为至少要进行5年的期程尚久，即因二二八事件后陈仪去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为省政府并关闭编译馆而去职。许寿裳在“事前毫无闻知下”，不能不感叹“骤然撤废，于台湾文化不能不说是损失”的惋惜心情下，转往台大中文系任职，又在不到10个月的1948年2月18日在台大官舍遇害，令人惋惜。在编译馆馆长任内，他到底如何筹划，又有哪些成果，由于时间不长，因而一向被忽视，直到黄英哲教授于1999年出版《台湾文化再構築（一九四五～一九四七）の光と影—鲁迅思想受容の行方》一书才较为人所知，他利用许氏家属提供的相关资料，介绍了台湾省编译馆的角色，仔细描绘了10个月内许寿裳文化工作的构图与进行，及达成的效果。我受国史馆的委托为黄教授的大作写书评时，即非常希望能看到与许寿裳先生相关的编译馆档案，十年后（2010）我终于在闽台缘博物馆要出版这些档案的前夕先睹为快。

这批档案共分为四大类，一、行政150件（影像296页），二、人事54件（104页），三、财务10件（21页），四、书信95件（245页），合计309件，影像666页。由于行政类亦包括部分人事和书信，因此数量较多。这些资料若和《许寿裳日记》一书中的日记与《许寿裳台湾时期年谱简编》对照，就会发现与编译馆相关的书信大部分都有在这批档案里，在将近60年后我们还能看到这批资料，真是弥足珍贵。

除了珍贵外，这批数据还有它的重要性，此即编译馆设置的目的与功能，原陈仪指示的只有编“中小学文史教本”、“中小学教师参考读物”、“适于公务员及民众阅读的小册”、“一般的参考书如辞典”、“将西洋名著翻译五六百部”，许寿裳却要在这之外加上南洋研究组和台湾研究组，最后仅多加了台湾研究组。到底加上台湾研究组是谁的主意？是否受到杨云萍的影响？而许、杨两人又如何认识？《许寿裳日记》中没有记载，1981年杨云萍在写《许寿裳先生的追忆》时，也只说许寿裳在北京时曾看过他中、日文著作，乃延揽入编译馆工作。

在这批档案中也可见到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许寿裳对台湾的观感，他在写信给陈大齐（百年）时说：“此间风景优美，秩序亦佳。惟经日人统治五十年，教育虽较普及农工，而国语几濒于消失。农业发达，工业亦有基础，非国内他省所能企及。”

在致家人的信中也说“此间风景甚佳，生活安适，非内地可比”。“台湾教育普及，农业发达，工业亦有基础，女工均至少受过六年教育，骑自行车，水果大佳。有些报上谩骂，是别有用意，不足信的”。他对台湾的第一个印象不坏，这就稍能印证黄英哲教授分析他愿意来台湾的原因是他和南京的政治气味不合，且认为当时台湾较为安定，故希望在台完成其撰写鲁迅传、蔡元培传的宿愿。

影响到编译馆的二二八事件，先是馆务停顿一个月，继则改组成省政府，终至闭馆，他对二二八事件的看法，在其日记中只有只言词组，该馆除“困守一夜不敢出”、“编审张常悝、刘世模二人被警备司令部拘出”、“仰秋昨日（3月2日）归途被击数拳”外，只有3月8日“夜十时后，开枪声甚密”、3月9日“台北军队到，知局势渐平”之相关记载。此次出版的书信有故旧门生来信关心二二八事件，如郑资约、李国瑛、朱文叔、陈忠耀、罗素一，他在答某友人的信中，对当天编译馆的情形有如下的叙述：“廿八日下午，本馆同仁正在办公，被暴徒攻入，其势汹汹，责问馆中本省人与外省人（暴徒竟声称打中国人，以中国人与台湾人对称，即此一端可推知其峙）待遇有否不公？幸本省同仁告以公，始一哄而去。如是者三次。是夜困居通宵，翌晨始送同仁各回本宅。公私损失要算最小，可请放心。”如未参考档案而仅用日记，很难明白二二八当天编译馆的情形。

在编译馆用人方面，许寿裳也大量任用浙江籍的乡亲，以1946年8月台湾省编译馆职员表中所列的35人，除了2个江苏人，1个广东人，1个台湾人，2个日本人外，其余29个都是浙江人，以后虽有少数变动，但仍以浙江人为多。在当时要改造台湾的心理所要的人，一定要能胜任此职者，而当时许寿裳看中的人有的在渝，有的在沪或其他地方，光是联络即是相当困难的事，尤其牵涉要辞去原职，安家费、旅费、薪水问题的种种考虑，从这批档案中的人事、书信都可以看到每个人为难之处。作为被心理改造对象的台湾人，许寿裳任用几个人呢？答案是陆续任用了4位（工友不计），一是杨云萍，他从未任公职的经验，却被破格任为编纂，且任台湾研究组主任，但他的官阶很低，只是“荐一”，在他任职期间还遭到女职员朱毅如“信口谩骂”（1947. 2. 3）、“戟手谩骂，任意侮辱人格”（1947. 5. 3），但杨仍非常努力规范台湾研究诸事，还想出版《台湾学报》，编台湾研究书目等。另一位是将国分直一等日本教授完成的论文译成中文的干事张樑标，他是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第三届（1933）的毕业生，彰化人。再一位是担任干事的赖子清，他曾在1935年编过《台湾诗醇》，曾担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及编辑，战后任台北市中学国文教员，于1946年11月被任命，在二二八事件中曾为馆员送饭。第四位是吕基正（初名许声基），1914年出生于台北，画家。在1947年2月12日被任命为助理编辑，负责“中小学教科书插图工作”。

在编译馆的馆务上陈仪长官充分授权馆长，但对一些原则上的事仍有其坚持，如

认为丛书组不必设立，开办费应予酌减，而出版则交由台湾书局而不必将出版经费编入，征求外稿要到1947年才办理等等。许寿裳因此也不能不做某种调适，但因陈、许间的情谊，陈对许的做法仍是大力支持。

从档案中还可看到，原为编纂兼学校教材组主任、后离职的朱文叔，努力为编译馆买书的种种奔波，书信中有不少是向许寿裳报告如何买书，买了什么书，用了多少钱，将如何送去台湾等，可见他对买书一事尽了全力。

以上种种都是可以深入再做研究的部分，但要研究省立编译馆和许寿裳，可能还有些数据是可以一并来看的，如国史馆台湾文献馆藏有省立编译馆的档案130多件，其中有陈仪任命许寿裳为编译馆馆长的手谕及相关人事资料。而当时台湾重要的报纸如《台湾新生报》、《民报》、《人民导报》，以及相关杂志中的报导，也值得重视。至于杨云萍的相关数据，原本是可以期待的，但本人有编辑杨云萍全集（即将出版）的经验，除了有许寿裳次子许世璠写给杨云萍的信外，没有其他有关的资料。

本档案得以出版，除了黄英哲教授将编译馆的相关原始数据提供出来外，闽台缘博物馆馆长杨彦杰教授，也用了不少人力，不仅将原档重新打字，而且把原档和打字稿一并印制，也依《许寿裳日记》的凡例予以编排，方便将来做成数据库或在网络上浏览。这些工作至为繁琐，在原档中有不少判读困难之处，也都能一一克服。此外，中研院台史所档案馆的王丽蕉主任和黄燕秋、游子宜两位助理协助影像比对，还搜集了杨云萍、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相关档案。上述每一个人都为本书的出版尽了心力。

如今有关许寿裳与编译馆的珍贵档案终于要出版了，对于研究战后初期的台湾省编译馆、台湾文化问题，以及许寿裳等相关人物，都有很大的帮助。本人在1993年曾获黄教授赠送其参与编辑的《许寿裳日记》，并为黄教授的大著写过书评；也写过《台湾光复初期的语文问题》（1991）、《杨云萍教授与台湾史研究》（2008），对台湾省编译馆有一定的认识；又在去年（2009）造访闽台缘博物馆，和杨彦杰馆长谈到此书出版的问题，再承黄英哲教授力邀我参与此书的编辑工作，并嘱我为序，不敢推辞，谨为之序。

导读：台湾省编译馆设立始末（1946.8～1947.5）

黄英哲

一、前言

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日本战败，台湾脱离日本的殖民统治，重归中国版图。长达半世纪的殖民统治期间，日本殖民当局强力推行同化政策，利用国家机器将日本文化移植台湾，并透过各级学校教育将日本国家、国民意识强加灌输予台湾青少年。此同化政策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之后，更为变本加厉，日本人在台进一步推行皇民化运动，禁止中文报纸发行与台湾民间宗教信仰，在全台各地设置皇民炼成所，企图以军国主义思想将台湾人^①塑造成“皇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部分台湾人被日本化而认同日本，亦是极其自然之事。关于台湾人的日本化，从著名作家叶石涛（1925～2008）的经验中可以得到验证，他回忆二战结束时，甚至连台湾话也不会说，因而断言，当时台湾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已经日本化了^②。尽管这个数字只是作家个人的主观感受，却相当程度上提示了日本战败前后当时台湾人的日本化情况。

战后对国民政府而言，台湾统治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将日本化的台湾人“国民化”。换言之，即是如何再度建立台湾人的国民、国家意识，将台湾“去日本化”与“再中国化”。为达此目的，国民政府遂在台湾彻底推行“中国化”的文化政策，展开一连串由上而下的文化重建（culture reconstruction）工作。台湾光复后，台湾省编译馆的设立，在国民政府的台湾文化重建工作中发挥了重要功能。

① 台湾光复后，一般对台湾住民的提法是将1945年台湾重归中国版图之前，居住于台湾的住民（福佬人、客家人）称之为台湾人或台湾同胞或本省籍，原住民则称之为山地同胞，将1945年以后，从大陆来台者，称之为外省籍。根据1946年台湾民政厅的统计数字，当时台湾的总人口有6090806人，其中本省籍有6056139人（包括88741人的山地同胞）占总人口的99.48%。而外省籍只有31721人，占总人口的0.52%（《台湾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人口篇，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66年，42页，122页）。

② 许雪姬：《台湾光复初期的语文问题——以二二八事件前后为例》，《思与言》29卷4期，1991年12月，页158。有关台湾人的日本化，尚可参考著名人类学家、原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教授金関丈夫（战后仍留任在改组后的台湾大学任教）的回忆（金関丈夫：《孤灯の夢》，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79年，页297）。

二、台湾省编译馆的设立

1. 《台湾接管计划纲要》

1943年12月2日宣布的《开罗宣言》中，声明日本战败后，应将台湾、澎湖和满洲一并归还中国。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蒋介石在开罗会议（11月22～26日）结束返国后，立即下令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行政与军事最高统率机关）所属的中央设计局下，设立台湾调查委员会，调查台湾情形，作为接收台湾的筹备机构。台湾调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即是日后出任台湾最初的统治机关“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长官陈仪。

台湾调查委员会成立后之首要工作，即是草拟《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该纲要迟至1945年3月23日才正式颁布。《台湾接管计划纲要》共分第一通则、第二内政、第三外交、第四军事、第五财政、第六金融、第七工商矿业、第八教育文化、第九交通、第十农业、第十一社会、第十二粮食、第十三司法、第十四水利、第十五卫生、第十六土地等十六大项^①。可视为接收台湾的蓝本及光复后初期台湾的施政方案。该纲要中，牵涉光复后台湾文化重建者，即第一通则的（4）及第八教育文化的（40）～（51），列出台湾文化重建的基本原则及具体的实行方案如下：

第一通则：

（4）接管后之文化设施，应增强民族意识，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机会，提高文化水准^②。

第八教育文化（40）—（51）：

（40）接收后改组之学校，须于短期内开课。私立学校及私营文化事业如在接管期间能遵守法令，准其继续办理。否则，接收、改组或停办之。

（41）学校接收后，应即实行左列各事：（甲）课程及学校行政需照法令规定。（乙）教科书用国定本或审定本。

（42）师范学生（校）接收改组后，应特别注重教师素质及教务训育之改进。

（43）国民教育及实习教育应依照法令积极推行。

（44）接管后应确定国语普及计划，限期逐步实施。中、小学校以国语为必修

^① 《台湾接管计划纲要—34年（1945年）3月14日侍秦字15493号总裁（卅四）寅元侍代电修正核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0～31。

^② 《台湾接管计划纲要—34年（1945年）3月14日侍秦字15493号总裁（卅四）寅元侍代电修正核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1。

科，公教人员应首先遵用国语。各地方原设之日语讲习所应即改为国语讲习所，并先训练国语师资。

(45) 各校教员、社教机关人员及其他从事业之人员，除敌国人民（但在专科以上之学校必要时得予留用）及有违法行为者，均予留用。但教员须举行甄审，合格者给予证书。

(46) 各级学校、博物馆、图书馆、广播电台、电影制片厂、放映场之设置与经费，接管后以不变动为原则，但须按照分区设校及普及教育原则妥为规划。

(47) 日本占领时强迫服兵役之台籍学生，应依其志愿与程度予以复学或转学之便利。其以公费送国外之台籍学生，得斟酌情形，使其继续留学。

(48) 日本最近在各地设立之炼成所，应一律解散。

(49) 派遣教育人员赴各省参观，选派中等学校毕业生入各省专科以上之学校肄业，并多聘学者到台讲学。

(50) 开设省训练团、县训练所，分别训练公教人员、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并在各级学校开办成人班、妇女班，普及国民训练，以灌输民族意识与本党主义。

(51) 日本占领时期印行之书刊、电影片等，其有诋毁本国、本党或曲解历史者，概予销毁。一面专设编译机关，编辑教科参考及必要之书籍图表^①。

上列纲要，即是尔后台湾文化重建工作依据的原则与具体实行方案。而台湾省编译馆（以下简称编译馆）的设立，在上述《台湾接管计划纲要》第八项教育文化中的第（51）条已明确列记。

2. 台湾省编译馆的设立

光复后台湾的接收工作，可以将它分成政治、经济、文化三个范围来思考，当时政府称之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与“心理建设”。所谓的“心理建设”即是台湾的文化重建工作。

陈仪在1945年的除夕夜，以“民国35年度工作要领”为题，透过收音机广播作了以下发言：

明年的工作可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与心理建设三大端。其原则依据委员长核定的台湾接管计划纲要。

政治建设在实行民权主义，其要点在使政府有能，人民有权。（略）

经济建设的要旨在增强生产，提高生活。（略）

^① 《台湾接管计划纲要—34年（1945年）3月14日侍秦字15493号总裁（卅四）寅元侍代电修正核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1年，页25～27。

心理建设在发扬民族精神，而语言、文字与历史是民族精神的要素，台湾既然复归中华民国，台湾同胞必须通中华民国的语言文字，懂中华民国的历史，明年度心理建设工作，我以为要重视文史教育的实行与普及^①。

至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与“心理建设”的具体做法，陈仪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施政方针》报告中，作了详细说明。1946年度“心理建设”的具体做法，陈仪在报告中说明道：

心理建设在发扬中华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意识，此为以前日本所深恶痛嫉，严厉防止，而现在十分需要者。其主要工作，第一、各校普设三民主义、国语国文与中华历史地理等科，加多钟点。并专设国语推行委员会，普及国语之学习。第二、增设师范学院、师范学校，大量培养师资。第三、各级学校广招新生以普及台胞受教育之机会。第四、对于博物馆、图书馆、及工业、农业、林业、医药、地质等实验、研究机构力求充实，以加强研究工作，提高文化。第五、设置编译馆，以编辑台湾所需要各种书籍，并着重中小学教科书之编辑^②。

从上述能够得知，1946年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施政方针》报告中，已正式将编译馆的设立纳入其中，作为光复后台湾“心理建设”，也即是文化重建工作的一环，换言之，即透过编译馆将此项工作落实。而此构想早在上述1945年3月公布的《台湾接管计划纲要》第八项教育文化的第（51）条已经明确列记。关于编译馆的筹设部分，陈仪邀请其同乡好友许寿裳来台主其事，期待自己的同乡好友与自己一起投入台湾的文化重建工作。

3. 许寿裳的赴台

许寿裳（1883～1948），字季黻（或季葑），浙江绍兴人。毕业于杭州求是书院。1902年9月，以浙江省派遣的公费留学生身份赴日本留学，先进弘文学院速成班普通科就学，在那里结识同乡陈仪、周树人（即鲁迅），三人真挚的情谊至死不变。1904年3月，从弘文学院毕业，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研习“教育、地理、西洋史”，1908年3月毕业。这段期间，他以行动反清，担任同乡会杂志《浙江潮》（1903年创刊）的编务，以鼓吹革命思想为己任，并加入光复会以及尔后成立的中国同盟会（1905）。许寿裳和鲁迅在弘文学院就读时，就认为改造中国国民性唯赖革命，他留学

^① 《民国35年度工作要领——34年除夕广播》，《陈长官治台言论集》第1辑，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1946年5月，页41～45。

^② 《中华民国36年度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工作计划》，1947年编制，页4。

时代的后半期，和鲁迅一起生活，并和鲁迅等数人同去旁听章太炎的《说文解字注》讲学。章太炎和在求是书院邂逅的蔡元培，都是许寿裳一生中最尊敬的师长。1909年许寿裳回国，任职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立即聘请许寿裳到南京的教育部工作，随着迁都，许寿裳也随着教育部的转移迁往北京，担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第一科长。此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为止，先后历任江西省教育厅长、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中山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干事兼文书处主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要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将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三校合并，在西安成立西安临时大学。许寿裳受聘为史学系主任兼教务委员。1938年，西安临时大学因战乱转移到汉中，改名西北联合大学。许寿裳虽兼任这所大学的法商学院院长，不久，因受到教育部长陈立夫的干涉，愤而辞去院长之职，专任史学系教授。1939年，西北联合大学改组为西北大学时，许寿裳辞职，同年冬天，前往云南，再度成为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因战祸，中山大学从广州迁到云南的澄江）。1940年春天，应私立华西大学（成都）的邀请，以庚款（英国义和团赔偿金所设）讲座教授身份前去执教。1941年夏天辞去华西联合大学教职，赴重庆担任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简任秘书，后任专门委员，重温公务员生活，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随着国民政府迁往南京^①。

前面已指出，经过五十年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日本化相当严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光复后初期，派往台湾从事教育工作者，不能不考虑其教育背景，也就是说，需要有留学日本的教育背景，通晓日语，对日本文化具有某种程度的理解，才容易推展教育、文化工作。许寿裳之所以被陈仪召请到台湾从事文化工作，也是因为具备有上述条件。其实不只是许寿裳，当时在台湾主持教育工作者，也皆有相同背景，兹列表如下：

职 务	姓名	出身学校	出身地
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长	范寿康	东京帝国大学	浙江上虞
台湾大学校长	陆志鸿	东京帝国大学	浙江
台湾大学教务长	戴运轨	京都帝国大学	浙江
师范学院院长	李季谷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浙江绍兴

（根据章子惠，《台湾时人志》〔台北：国光，1947〕制表）

^① 许寿裳的略历沿袭北岡正子、黄英哲，《〈许寿裳日记〉解说》的记述，该《解说》收于北岡正子、黄英哲和秦贤次编，《许寿裳日记：自1940年8月1日至1948年2月18日》，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研究中心，1993年。《解说》中关于许寿裳的略历基本系根据许世瑛，《先君许寿裳年谱》撰成，该《年谱》收于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卷22，北京：中国文联，1989年，其后再增补。

1946年5月1日，陈仪从台湾打电报到南京，给时任国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专门委员的许寿裳：

为促进台胞心理建设，拟专设编译机构，编印大量书报，盼兄来此主持，希电复^①。

接到陈仪电报后，许寿裳颇为犹豫，5月4日，他写给友人谢似颜如下的信：

得公洽兄密电，略谓“为促进台胞心理建设，拟专设编译机构，编印大量书报，盼兄来此主持”。弟意能游光复后之台湾，非不甚愿，惟所云拟设机构，既未悉其详情，弟个人复有种种牵制，中以经济困难为第一，踌躇莫决。^②

5月13日，陈仪又再度从台湾寄了亲笔私函给许寿裳：

电、信都受到。

兄愿来台工作，很高兴。台湾经过日本五十一年之统治，文化情况与各省两样。多数人民说的是日本话，看的是日本文，国语固然不懂，国文一样不懂，对于世界与中国的情形，也多茫然。所以治台的重要工作，是心理改造，而目前最感困难的，是改造心理的工具——语言文字——须先改造。各省所出书籍报纸，因为国文程度的关系，多不适用。台湾的书报在二三年内，必须另外编印专适用于台湾人的。第一要编的是中小学文史教本（国定本、审定本，全不适用）；第二要编的是中小学教师的参考读物，如中学教师、小学教师等月刊；第三为宣达三民主义与政令，须编适于公务员及民众阅读的小册；第四一般的参考书如辞典等。这是就台湾的应急工作而言。此外弟常常感觉到中国现在好书太少了。一个大学生或者中学教师，要勤求知识，非读外国书不可。不但费钱，而且不便。我常有“译名著五百部”的志愿，我以为中国必须如以前的翻译佛经一样，将西洋名著翻译五、六百部过来，使研究任何一科的学生，有该科一、二十本名著可读……

为了右面的五种工作，我拟设一编译馆，台湾总督府规模宏大，惜大半被毁于空袭，为留纪念计，拟以三年工夫，把它修复起来，作为台湾省文化馆，其中包含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体育馆，而编译馆亦在其中，合为五馆。该馆直隶长官。教育处旧有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可并入，编制预算，俟兄到后再定。

① 陈仪致许寿裳电报，1946年5月1日。

② 《许寿裳书信集》，杭州：浙江文艺，1999年，页214～215。

这样的工作，为台湾、为全国，都有意义，望兄化五年工夫来完成他^①。

从这封私函能够知晓，许寿裳经过短暂考虑后，最后还是答应了陈仪的聘请。同时这封私函又能够理解陈仪将“心理改造”工作，即文化重建工作，列为“治台”的首要工作，怀着热情与理想，对编译馆的业务予以很大期待，同时也为编译馆的组织和工作内容，描绘了蓝图。

许寿裳的赴台，除了好友陈仪的力邀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动机，其女儿许世玮有以下证言，

一九四六年初夏，父亲从重庆回到上海和家人团聚……

他对我们说，南京的政治空气对他不合适，所以接受了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之邀，到台湾去担任编译馆馆长。

……

父亲所以到台湾，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台湾是个比较安定的地方，希望能实现他的夙愿，完成《鲁迅传》和《蔡元培传》的写作^②。

《鲁迅传》的撰写，确实是鲁迅歿后许寿裳长年所想。从1940年10月19日的日记即可得知：

鲁迅逝世已四周年，追念故人，弥深怆恻，其学问文章，气节德行，吾无间然，其知我之深，爱我之切，并世亦无第二人，曩年匆促间成其年谱，过于简略，不嫌于怀，私为作传，则又苦于无暇，其全集又不在行篋，未能着手，只好俟诸异日耳^③。

从上述可以了解许寿裳赴台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对台湾文化的重建，需要有留日背景，对日本文化、日语有某种程度的了解与造诣的人才赴台从事文化工作。另一方面是他与陈仪的深厚关系。传统中国社会非常重视同乡、同窗的关系，所以陈仪才力邀他来台湾担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再者，或许就是如许世玮所言，许寿裳想利用台湾安定的环境完成《鲁迅传》与《蔡元培传》的写作计划。

① 陈仪致许寿裳私函，1946年5月13日。

② 许世玮：《忆先父许寿裳》，收入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卷14，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305～307。

③ 北岡正子、黄英哲、秦贤次编，《许寿裳日记》，页38。

三、台湾省编译馆的工作内容

1. 台湾省编译馆的组织

1946年6月25日，许寿裳抵达台北，27日，参考《国立编译馆组织条例》起草《台湾省编译馆组织大纲草案》送交长官公署审查，并设立准备处开始筹设。7月8日，长官公署正式任命许寿裳为编译馆馆长，同时将原长官公署教育处的教材编辑委员会^①和编审室并入编译馆。8月2日，《台湾省编译馆组织规程》公布，8月7日，编译馆公印即日正式使用。至此，编译馆正式成立。严格而言，应该是1946年8月7日成立的^②。

编译馆的设立是陈仪发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令》，制定台湾省单行法规——《台湾省编译馆组织规程》，给予法的根据。

《台湾省编译馆组织规程》于1946年8月2日公布，共十五条，以下列出：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令

兹制定台湾省编译馆组织规程公布之。此令。

台湾省编译馆组织规程

第一条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为编译本省教育图书及学术文化书籍起见，特设台湾省编译馆（以下简称本馆）。

第二条 本馆编译下列各项图书：

- 一 关于本省各级学校教科书及参考需用图书；
- 二 关于本省一般民众需用图书；
- 三 关于辞典类书籍；

① 教育处教材编审委员会并入编译馆时职员名册如下：

主任委员：王鹤清；专任委员：朱文叔、郑桓、洪鋈、张常惺、蒋超龙；专任编辑：缪天华、杨肃、林万燕、林子青、邵元照、张逊之、李焕彬、何翠嫦、黄承荣；日藉助理员：片濑弘、宫田弥太郎、宫田金弥；干事：钱文照；书记：陈佐华、吴敏、吴家熙、徐世仁、周基文、周勤宜。《教育处教材编辑委员会职员名册》。

② 编译馆成立当初，其职员名册如下：

馆长许寿裳；编纂兼主任秘书王鹤清；编纂兼学校教材组主任朱文叔；长官公署参议兼编纂杨云萍；长官公署参议兼编纂姜琦；长官公署参议兼编纂沈其达；编纂：郑桓、谢似颜；编审：洪鋈、缪天华、林万燕、林子青、张逊之、邵元照、杨肃、蔡镇、梁嘉彬；干事：吴祖型、丁士镛、钱文照、梁瓯倪；助理干事：陈光、范福云；助理员：片濑弘、宫田弥太郎、宫田金弥；会计员：周正中；股员：钱绍璜；书记：胡学彦、朱谷谿、吴家熙、陈佐华、周勤宜、周基文、徐世仁、平训麟。《台湾省编译馆职员一览》35年（1946）8月填造。